

结婚移民日本的中国女性的社会网络 ——以兵库县 T 地区为例

胡源源 *

摘要： 本文以结婚移民日本的中国女性为研究对象，考察她们嫁到日本之后相互之间建构的社会网络关系。按照她们嫁到日本的年数，本文将她们分为“经验世代”、“适应世代”、“新手世代”。研究发现，在移民目的地存在一定数量的中国女性但她们相互之间没有结成一定规模的互助组织。“经验世代”到日初期建立了紧密的“小组型”社会网络，后来这种网络逐渐弱化成“松散的联盟”；“适应世代”的社会网络也呈现出“小组”关系特征；“新手世代”的社会关系流动性大随机性强、成员不稳定。

关键词： 中国女性；结婚移民；日本农村；社会网络

一、引言

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农村男性结婚困难的问题凸显出来，为了解决此问题地方政府与民间中介机构联手从菲律宾、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国家迎娶外国妻子，^①日本“农村跨国婚姻”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日本学界将“农村跨国婚姻”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1. 农村“家”观念的残存导致日本女性不愿与守“家”的男性结婚，尤其是长男在婚姻市场上非常不受欢迎甚至被敬而远之。2. 农村女性从农村流向城市造成农村人口结构不平衡。3. 日本女性的结婚意识发生变化。结婚目的已不再是单纯为了生活保障，如果不是自己理想的结婚对象不会向婚姻迈出步伐。

据日本官方数据显示^②，2015 年夫妻一方是外国人的婚姻占日本婚姻总数的 3.3%，其中外国女性是日本跨国婚姻的主力，占日本人外国配偶者的 70.6%。在外国女性中，中国女性占 38.7%、菲律宾女性占 20.7%、朝·韩女性占 15.3%。1997 年中国女性超越菲律宾女性，成为日本男性最大的跨国婚姻结婚对象。2000 年以后每年平均有 1 万以上的中国女性嫁往日本。2009 年中日跨国婚姻达到高峰，当年有 12733 名中

• 作者简介：胡源源，女，毕业于日本神户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跨国移民，日本华人华侨，婚姻家庭。

① 于结婚移民到日本农村的外国女性的称谓，日本学界有“农村新娘”、“外国新娘”、“外国妻子”等称呼，本文采用“外国妻子”的称呼。

② 日本厚生劳动省，第 1-37 表（婚姻件数，年度×夫妻国籍）。源自：<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suii09/marr2.html>

国女性结婚移民到日本。2011年后嫁往日本的中国女性逐渐减少，即便如此每年仍有6000人左右赴日。保守估计，从1970年至今至少有22万中国女性结婚移民到了日本。

何雪松指出，移民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的适应性议题是社会网络的解组与重构。^①森岡青志认为，个人的社会网络是亲属、友人、近邻、职场等各领域网络的总和。个人社会网络的内容由网络关系的性质、关系动机、关系容量、关系主体的类型构成。关系性质可分为上下的一平等的关系、关系动机可分为手段的一表面的关系；关系容量可分为多层-单一的。^②本文旨在考察结婚移民日本的中国女性与当地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将社会网络设定为中国女性与家庭成员以外的个人及集团之间的关系，具体从中国女性之间建构的社会网络入手。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由于在国外进行长期的移民追踪研究受诸多条件的限制，目前国内关于中国女性结婚移民日本的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处于萌芽阶段相关研究非常少。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高莉分析了中日跨国婚姻的现状；^③师艳荣列举中日跨国婚姻中存在的问题；^④关日昇讨论了婚后中国女性在日的生活适应。^⑤关于她们在日的社会网络建构在上述研究中没有涉及到。

在移居地日本，中国女性作为外来移民受到当地学者的关注，但是单独以她们的社会关系为对象的研究并没有。从1980年代日本“农村跨国婚姻”发足开始，日本学界把嫁到农村的亚洲女性统归为“外国妻子”、“东亚妻子”，即在研究上不分国籍把她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2000年以后学者们才逐渐认识到整体内部的多样性，进而开始把她们按照国籍详细区分加以讨论。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也是2000年以后才从“外国妻子”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与她们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生活的私领域方面，她们与家庭外公共领域的接触并没有被讨论。关于她们的社会网络关系研究的梳理只能从她们还被掩埋在“外国妻子”、“东亚妻子”的阶段开始整理。

宿谷京子指出，在农村，外国妻子没有建立社会关系很难看到外国妻子有可以依

① 何雪松：《新移民妇女的网络建构：移居香港第一年的纵贯质性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6期。

② 森岡清志：《社会的ネットワーク論—関係性の構造化と対自化》，《社会学評論》，1979年第30(1)期。

③ 高莉：《多元化价值取向下的中日跨国婚姻研究》，《河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2)期。

④ 师艳荣：《中日跨国婚姻问题分析》，《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4期。

⑤ 关日昇：《中日跨国婚姻与中国女性在其中的文化适应性研究》，2016年硕士论文。

靠的邻居。外国妻子无缘主流社会孤立地存在着。^①在早期的研究中外国妻子被描述成“孤立的存在”、“社会的无缘者”。随着嫁到日本农村外国妻子的增加，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她们的社会关系，例如石沢真贵在秋天县羽后町调查后有如下描述，与邻居的交往不是特别紧密。……但是通过手机和邮件与朋友间的联系却很广，与较远的朋友也有交际。^②再如南红玉考察山形县与福岛县的外国妻子的定居与社会参与后指出，外国妻子的社会网络是促进她们在当地定居下来的重要因素之一。南有以下论述，山形县的外国妻子来自不同的国家而且她们来日时期也不一样，同一地区内的外国妻子之间没有形成坚固的社会网络，如果扩大地理范围兼顾到其他地区存在着“同胞”关系。然而在福岛县，同一地区的外国妻子间建立起了强固的“同胞”关系。外国妻子间的社会关系不仅局限于她们自身之间的交往还扩大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交往。外国妻子在与邻居的交往及地区活动的参与上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③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早期“孤立的存在”、“社会的无缘者”等观点被逐渐修正，外国妻子的社会网络研究不断被深化。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学者们对外国妻子社会关系的研究依旧粗糙且笼统。例如南只用了“没有形成”，“强固”[8]等词语来描绘外国妻子的社会关系，这只不过是对社会事实单纯地记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关于其中的理由没有深入考察。另外，笔者对南以居住地区来衡量外国妻子的社会网络表示质疑。福岛县与山形县都位于日本的东北地区，不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文化都属于东北圈。从某种意义上这两地的差异并不明显，以地区对外国妻子的社会网络特征加以区分明显缺乏说服力。

樋口直人指出，在移民与社会网络的研究中确认“社会网络是否形成”不是研究的结论 只不过是研究的出发点。为了从“社会网络是否形成”这一单调的结论中挣脱出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各自的社会网络在哪些方面重要等讨论是必要的。^④从上述分析看到，虽然目前日本学界关于外国妻子的社会网络研究已经跳出“有无论”的框架但对其特征的细致讨论还远远不足，例如樋口指出的“各自的社会网络关系在哪些方面重要”的探讨就非常匮乏。基于以上，笔者将“世代”变量引入中国妻子的社会网络的讨论中。所谓世代，指根据女性嫁到日本的年数（在日本定居的年数）将她们分为不同集团。来日5年未滿称为“新手世代”，来日5年以上10年以下称为“适应世代”，来日10年以上称

① 宿谷京子：《アジアから来た花嫁》，明石書店，1983年第250～259页。

② 石沢真貴：《定住外国人の現状と地域コミュニティの課題——秋田県羽後町の外国人妻に関する聞き取り調査を事例にして》，《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研究紀要》，2004年第59期，第70页。

③ 南紅玉：《外国人花嫁の定住と社会参加》，《東北大学大学院教育研究科研究年報》，2010年第59期。

④ 樋口直人：《国際移民と社会的ネットワークの再編成：滞日ブラジル人企業家を事例として》，《徳島大学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8期。

为“经验世代”。据笔者调查嫁到 T 地区的中国女性中有的已旅居日本 30 年以上,有的则不满 1 年。不难想象二者在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上及应对能力上有很大差异,不能将她们笼统地归在一个范围内进行粗略的分析,应依据各自的特点分别讨论,否则容易看漏她们的多样性。再者,日本“农村跨国婚姻”从发生到现在已经有 30 多年,在这 30 多年的时间里嫁到日本的中国妻子的属性发生了很大变化。所谓属性指外国妻子的年龄、出身地、结婚经历等。据笔者调查,1980 年代中后期与 2000 年以后来日的中国女性,在出身地与结婚经历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特征。前者的年龄多集中于 20 岁左右,后者多在 30 岁至 55 岁左右,另外前者多来自上海周边地区且是初婚者,后者多来自中国的东北地区且是离婚者。中国女性的属性与她们来日后社会网络的建构直接相关。例如在后文中将会详细论述,1990 年代初来日的“经验世代”与 2010 年以后来日的“新手世代”在社会网络的成员的选择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外国妻子的属性与社会网络的关系被完全忽视,因此在本文笔者将“世代”引入讨论中。

三、调查地与中国妻子的基本信息

T 地区位于日本兵库县^①的北部,北临日本海,南靠丹波地区,东临京都,西靠鸟取县。人口 168.150 人,65 岁以上人口比例 2005 年 27.8%,2010 年 30.3%。^②

表 -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事例		年龄	职业	初婚	最终学历	出身地	结婚年数(5)	孩子(1)	孩子(2)	娘家	与婆家人同住
C	夫	43	正式职员	Y(3)	不明		6 年	有			N
	妻	29	临时工	Y	高中	陕西	6 年	有	无	农民	N
LY	夫	55	临时工	Y	不明		4 年	无		兼农(6)	Y
	妻	40	临时工	N	小学	辽宁	4 年	无	有	农民	Y
YK	夫 1	不明	不明	N	不明		1 年	无		不明	不明
	夫 2	49	正式职员	Y	不明		8 年	无		农民	Y
	妻	43	个体	N	初中	陕西	8 年	无	有	农民	Y
IG	夫	52	正式职员	Y	不明		24 年	有		兼农	N
	妻	46	临时工	Y	高中	上海	24 年	有	无	退休	N
LP	夫	52	个体	N	不明		6 年	无		兼农	Y
	妻	41	临时工	N	高中	辽宁	6 年	无	无	农民	Y

笔者基于访谈调查作成。注:

(1) 与日本丈夫的孩子。(2) 与中国前夫的孩子。(3)Y 是 YES 的意思。(4)N 是 NO 的意思。

① 日本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中国的省。

② 兵库县人口推算,源自: <http://www.tajima.or.jp/modules/kouiki/index.php/tajimagaiyou.html>

四、研究发现

（一）没有结成互助组织的中国妻子

李善姬指出，生活在日本农村的韩国妻子互相之间没有结成互助组织。李认为，在中介介绍的跨国婚姻里对韩国妻子们而言，同处于女性立场本身就已经是竞争的开始，为了从固有的观念中逃离出来她们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尽量融入到日本人中，即“战略性的不可视化”。另外跨国婚姻女性成功的路径在于进行具有民族特色的商业经营。由于她们拥有相同的文化资本，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竞争的格局。^①李也顺便提到了在日中国妻子的社会关系，李认为中国妻子与韩国妻子一样没有建立起具有一定组织规模的社会关系。基于在 T 地区的调查，笔者支持李的结论但笔者不同意李的解释。笔者认为嫁到日本的中国妻子不像韩国妻子那样，从选择结婚这条路开始就存在着明显的竞争而且中国妻子也不像韩国妻子热衷于用民族资本进行创业。笔者发现，中国女性嫁到日本后多是劳动者受雇于当地工厂，很少有人短时间内利用民族资本进行创业。

据笔者调查 T 地区大约居住着 80 ~ 100 名中国妻子，^②即在 T 地区中国妻子具备结成互助组织的客观环境而且分散在各地的日语学习班为中国妻子的社会网络建构提供了场所。她们之间没有结成互助组织另有其因，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拒绝被序列化

笔者发现，结婚移民到日本的中国妻子平时有意识地避免与中国女性过于密切的交往，原因之一是中国女性避免并拒绝让自己在日本妻子这个集团里被序列化。以下是“经验世代”IG、“适应世代”LP、“新手世代”LY 的事例。到笔者访谈时为止，IG 在日本定居 24 年、LP6 年、LY4 年。

IG：近几年嫁到日本的女性比我们当年的情形要好多了。现在她们一来（日本）身边就有很多中国人不会觉得寂寞。经常从朋友那儿听到有中国人嫁过来的消息，但是我与她们没有交往，我现在与这几年来的人之间完全没有交集。日本邻居偶尔

① 李善姬：《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仲介型結婚移民—東北農村の結婚移民女性たちにおける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李善姬・中村文子・菱山宏輔《移動の時代を生きる一人・権力・コミュニティ》，东信堂，2012 年，第 34 ~ 37 页。

② T 地区的政府有关于当地外国配偶的粗略统计但没有进行国籍区分，所以无法把握当地中国妻子的具体数量。此数据是笔者基于在 T 地区多年的调查推测出的数据。

会说介绍个中国朋友给我认识，我总是以已经习惯日本生活为由委婉拒绝。

当初和我一起嫁来的有 5 位中国女性，我们都是上海那边的。现在我与其中 2 位一直有联系，与另外 2 位已经断了联系。一方面因为性格不合，另一方面那 2 人总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而我们 3 人不会在背后说坏话不会互相指责，不会互相嫉妒更不会互相伤害。

LP：虽然认识很多嫁过来的（人）但互相没有联系，周围有谁新嫁过来，名字以及住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她们跟我没有关系，对我而言她们都是外人，与中国（女）人交往深了就容易出现麻烦事。中国人聚在一起喜欢谈论各家家里的事儿，结果就开始互相攀比，我讨厌谈论家里的事情。现在住的村子里除了我以外还住了 2 个中国人也是嫁过来的，虽然住的近但并没有成为朋友。

LY：我知道这附近有很多和日本人结婚来的中国（女）人。通过朋友介绍我也认识了几个。平时工作和家里的事都忙不过来了，除了与个别人偶尔联系外几乎没有接触，说实话不想与她们交际。大家聚在一起就开始讲别人家的事情说一些别人的坏话，谁家丈夫每月给多少零花钱，谁家丈夫人品怎么样，谁跟婆婆的关系怎么样，全都是这样的事儿，说着说着就开始攀比，我不太会讲话所以不想跟她们走得太近。

对于学历不高有离婚经历的中国女性而言，与日本男性结婚是为了在国际婚姻市场上获得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夫家的生活水平及丈夫的经济能力是衡量她们的目的是否达成的重要标准。即使中国妻子不是刻意要与周围人攀比，对于在完全不了解日本的情况下嫁入日本的她们而言，在日本自己处于怎样的生活水平或者自己丈夫的经济能力在日本处于怎样的位置，如果不与周围的中国妻子信息交换她们无从判断。所以一旦大家聚在一起，家里的事情很容易变成谈资。

另外，语言与文化差异在数年内是夫妻间不可消除的障碍。在障碍未消除的几年里，对中国妻子而言，日本婆家对自己如何特别是日本丈夫待自己如何，往往不是通过语言交流或借助只言片语表达出来的情感来感受，婆家和日本丈夫给她们的生活费或零花钱更能直观地让她们感受到她们在婆家的地位，很多中国妻子认为丈夫在金钱上的考量意味着丈夫甚至整个婆家对自己的态度。因此中国妻子一旦有相聚的机会，无论是出于单纯的信息交换还是出于确认自己在家庭中所处地位，互相诉说生活状况是极其平常的事情。然而嫁到日本的中国妻子并不是都进入了生活水平和经济能力相

同的同质家庭里，婆家的条件千差万别，因此她们自然而然会被序列化。条件最好处于最高端的永远只有一人，除此之外对其他任何人而言永远有比自己生活得好的人。在中国妻子看来，来日之前的生活已然成为过去式与来日后的生活毫无关系，由于她们都不是与丈夫恋爱结婚而是付了高额手续费通过中介嫁到日本，所以这样的经历让很多中国妻子认为来到日本其实意味着大家又同样地站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既然是新的起跑线为什么自己没有嫁到条件更好的丈夫，特别是夫家条件较弱的女性很容易对比自己嫁得好的人产生嫉妒。如 LP “结果就开始互相攀比”，IG “不嫉妒”，LY “谁家丈夫每月给多少零花钱”等所言。通过这些言语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妻子之间存在严重的相互攀比，另一方面中国妻子对这种攀比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因此很多中国妻子刻意不与其他中国妻子密切来往，尤其是那些夫家条件相对较弱的中国妻子，她们认为丈夫经济条件差让她们在其他中国妻子面前很没面子。

世代间的隔阂

中国妻子除了避讳自己被序列化外，世代间的隔阂也是阻碍她们结成互助组织的原因之一。以下通过 IG 的叙述进行考察。

IG：T 地区的 YK 市与 YF 市周围住着很多从中国嫁过来的（女性），特别是 YK 市有很多从中国北方例如哈尔滨、大连来的，听说 YK 市有专门从这两个地方介绍（女性嫁到日本）的中介。去超市或商店买东西时，经常能听到中国人大声说话，中国女性来日后声音依旧很大。我来日本已经很多年了思维模式已经日本化了，平时不与中国人交往。

“经验世代”IG 来日已经 20 多年，作为前辈她有对后来者提供一些帮助，但从她的言谈中可以看出她并没有给后来者很多关照，不但如此在交往方面也表现出极为消极的态度。笔者认为 IG 的消极源于“世代间的隔阂”。所谓隔阂是指，由于中国妻子们在日定居的时间不同导致她们对日本文化的认识与接受程度不同，进而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行为模式也不一样。例如 IG 所说的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的例子。在中国，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并不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但在日本这被认为是非常没有修养且给别人造成麻烦的事情。在公共场所大声说话的社会宽容度中国要远远高于日本。对久居日本的 IG 而言，日本的文化价值观已经潜移默化地转变为自己的行动准则，类似于在公共场所大声讲话的事情，她的衡量标准已不是宽容的中国人标准而是严苛的日本人标准。

据笔者调查，“经验世代”由于久居日本，在中国习得的文化习惯、行为规范已逐步弱化甚至被取代，以日本的文化习惯作为自己行动标准的现象普遍存在。而“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特别是“新手世代”由于来日时间尚短并不熟知日本的社会规则与思维方式，行动模式完全是中国式的，因此她们相互之间难免产生碰撞或关系紧张。这种紧张不仅存在于“经验世代”与“新手世代”之间，“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虽不及前两者之间那么深但也同样存在。对日本文化的接收程度不同产生的隔阂是阻挠中国妻子之间结成互助组织又一原因。

中国区域差异的再现

赛汉卓娜指出，中国东北地区跨国婚姻增加期比上海要稍晚，2000年已是上海“跨国婚姻的成熟期”，但中国东北这一时期只是“跨国婚姻的增加期”。^①戴二彪指出，1985年~1990年期间全国范围看，在对日移民的数量上北京和上海比例最高，进入1990年代后北京和上海的移民规模缩小内陆地区增多，特别是东北的吉林省与黑龙江省的比例增高。^②据笔者调查，定居T地区的中国妻子世代不同她们在中国的出身地也不同。“经验世代”多来自上海周边地区，而“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大都来自东北地区。笔者认为中国妻子的出身地这一属性给她们在日社会网络关系的构建带来很大影响。

IG：即使在国内，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文化习惯及性格也有很大不同。我作为南方人有点不太能接受北方人的说话方式。例如喝水时，如果这个水不好喝不想喝时我们南方人不会碰这杯水，而北方人可能就非常直率地说“这水不好喝，我不需要”之类的话。所以在日本我也不会和北方人接触，我的2位朋友也没有和北方人交往。

中国有“一方水土一方人”的谚语，不同地区的人其性格也大不相同。从地理概念上，国家有“北方”和“南方”的区域划分，不同地方有浓厚的区域文化。孔维民论述过北方人性格粗犷、豪爽，真诚坦率，爱憎分明；南方人性格婉转和顺、细腻，感情浪漫而含蓄。^③上述IG的话可以看出，由于国内地域文化上的差异使IG在旅日后依然与北方人保持距离。

① 赛汉卓娜：《國際移動時代の國際結婚》，勁草書房，2011年，第81页。

② 戴二彪：《中国新移民的移出地構造の變動—經濟發展の國際人口移動への影響》，《經濟地理学》，2004年第50(1)期，第66页。

③ 孔维民：《一方水土一方人—南方人与北方人性格差异及其成因初探》《淮北煤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56页。

此外笔者还发现除了南方与北方的差异中国的城乡差异也影响到了她们的社会网络。

IG：我在日本居住太久对国内的情况已经不是很了解了，即使回国每次在国内最多待 2 周。我当年还没来日本的时候，听说东北经济稍微落后特别是农村比较贫穷，听说东北很多地方都是农村，现在还是这样吗？偶尔与她们接触一下能感受到她们各方面跟我都不一样。

众所周知，中国曾有农村—城市二元户籍制度。在 90 年代，在中国如若拥有上海户籍会有一种作为“上海人”、“城里人”的自豪感，这种在中国被赋予的优越感在跨国移动的同时被带到了日本。从 IG 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在她的潜意识里有“上海”=“城市”，“东北地区”=“农村”的思维定式，作为来自城市的她与来自东北地区的中国妻子不一样，所以在交往上就自动规避起来。综上，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地域差异加上“城市—农村”二元结构的先入观念，“经验世代”与“适应世代”、“新手世代”之间存在着双重的地域隔阂。这种在国内被植入的观念在移民日本后重新显现出来，成为影响中国妻子建构社会网络关系的因素之一。

（二）不同世代中国妻子的社会网络关系

既然 T 地区的中国妻子之间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互助组织，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之间结成了怎样的社会关系呢？以下分“世代”进行讨论。

“经验世代”的社会网络关系

由于“经验世代”在日定居时间长对其社会网络分析时不仅要分析她们与“适应世代”、“新手世代”的关系，同时要从纵向的时间轴上把握她们内部社会网络的变迁。

IG：刚来日本的时候只有 2 个朋友（与 IG 一起嫁到日本的中国人），那时周围没有中国人，我们每周都要聚一次。在一起时就讲婆婆和丈夫的事情，连生几个孩子我们都商量过，在得知日本的家庭习惯和性别分工后，大家商量好都只生一个孩子绝对不生第 2 个。现在我们 3 人各自都只有 1 个孩子。当时我们甚至商量说要离婚一起逃回中国（哈哈~ ~ 笑）。

从每周都相聚到采取一致的生育计划可以看出，刚到日本不久的 IG 与中国女性之间建立了密切的社会关系，另外从“只有 2 个朋友”可以看出当时朋友的数量很少。笔者将这种人数少且关系紧密的社会关系称之为“小组型”社会网络。这种网络形成

的背景是当时“周围没有很多中国人”，即使想与同胞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身边也没有太多中国人，即缺乏建立社会关系的外部环。虽然 1990 年代初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呈现增加的趋势，但从人数上看每年仅有不到 4000 人，这个数值是中日跨国婚姻高峰期的三分之一。^①

那么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紧密的“小组”关系是 20 多年如一日保持下来，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呢？

IG：我们 3 人住的不近但也不远，开车只需 1 小时左右，3 人都会开车，如果想见面的话

就是开车出来的事儿，但我们没有频繁见面。今年 2 月还下雪的时候，她们打电话过来说雪

化了后我们 3 人聚一下，我当时说 4 月开春后比较好，现在夏天都快过完了还没见着。现在我们每年大概只有 1、2 次电话或邮件联系。

通过上文“经验世代”社会网络的变化一目了然。由 20 年前每周都相聚的高频率见面减少到现在每年只有 1、2 次电话或邮件联系。虽然联系没有中断，但当初紧密的关系已经荡然无存，即随着时间的流逝“经验世代”之间的社会网络逐渐弱化。笔者将这种没有完全断绝但已经弱化的社会网络称之为“松散的联盟”。

接下来看“经验世代”与“适应世代”、“新手世代”之间的关系。从结果来讲“经验世代”与“适应世代”、“新手世代”之间的关系非常疏远，几乎没有联系。其中原因除了上文中论述的世代间的隔阂与中国国内地域文化差异的再现外，“经验世代”的生活独立性高也是原因之一。。在前一节中 IG 提到“日本邻居偶尔会说介绍中国人给我认识，我总是以已经习惯日本生活为由委婉拒绝”。从这句话中可以读到两点信息，第一，在与中国妻子的交往上 IG 表现出消极且避讳的态度。第二，从她说的“习惯”一词中可以看出，IG 的生活自立性很高不需要依赖其他中国人。从表-1 可以看出，来日中国妻子的学历低且她们不像留学生或技术人员那样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生涯而移民。于她们而言，嫁到日本其实是把自己的生活基盘从中国转移到日本，在日本构建自己的生活世界。

^① 日本厚生劳动省，第 1 - 37 表（婚姻件数，年度 × 夫妻国籍），源自：<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suii09/marr2.html>

所谓生活世界，在此可以理解为工作单位、孩子（如果有孩子）的学校、医院、政府部门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对简单的农村，只有以上几个地方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只要对它们熟悉生活上不会有很大不便。中国妻子来到日本一段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语言障碍后，一个人足以应付这些机构，这里的一段时间最多3年。像IG这样在日定居20多年的“经验世代”，她们在生活上几乎不会有任何不便，一切都可以自己应付自如。IG曾很自豪的跟笔者讲，由于和婆家的小姑关系不好，婆婆过世时关于葬礼小姑没有给她任何帮助，完全凭她一个人完成了所有繁琐的仪式包括招呼日本亲戚，作为一个外国人她为自己的自立感到自豪。所以高度的生活自立是“经验世代”与其他世代中国妻子疏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据笔者调查，“经验世代”不去日语学习班学习也很少参加当地外国人支援机构举办的活动，这就使她们没有与“适应世代”和“新手世代”相遇的机会，加上前述对日本文化接受程度的差异，这些综合在一起就造成了相互之间关系非常疏远的结果。

“适应世代”的社会网络关系

2000年以后嫁到日本的“适应世代”从登陆日本的那一刻开始，周围就已经生活着很多和自己一样通过结婚移民到日本的女性，而且很多都来自中国同一地区，即相互之间不仅是同胞而且是同乡，“经验世代”当初完全没有这样的环境。尽管如此调查发现“适应世代”的社会网络依然是“小组型”。为什么在具备有很多本国人的外部环境却出现了与“经验世代”相同的社会关系特点呢？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与“经验世代”接触少。在上文中提到“经验世代”在与同胞的接触上持消极的态度，笔者发现“适应世代”同样也不积极。在生活适应方面，“适应世代”虽达不到“经验世代”的水平，但基本上能够自立不需要向“经验世代”求助，所以她们没有向“经验世代”靠拢。

第二，与“新手世代”关系疏浅。“适应世代”作为“新手世代”的前辈，与“经验世代”相比她们与“新手世代”接触的机会比较多。笔者在参加当地NPO的活动时经常看到“适应世代”的身影，因此推测她们与“新手世代”建立社会关系的可能性比较大，但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之间同样没有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中原因在C的话语中寻找。

C: 我平时不怎么与在日本学习班认识的中国妻子交往。前一段时间 NPO 的工作人员拜托我帮助刚嫁过来的 SM。既然被托付我就主动联系了 SM 问她有什么需要。从那以后 SM 只要有事情就给我打电话咨询各种问题。例如签证或是回国买机票等, 只要与生活有关的事她都打电话问我, 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她就不联系我了。刚来日本时都是什么也不懂, 日语也不好, 有问题只能问中国人, 她的处境我非常明白, 但是怎么说呢, 我的感觉就是她在有事的时候就一个劲给你打电话问这儿问那儿, 没事的时候就把你抛到脑后完全不联系你。站在我的立场上, 我作为帮助她的人感觉自己只是被利用, 真的是单纯地被利用。有困难的时候突然把你拽出来求你帮这儿帮那儿, 没事的时候就完全不理你, 我对她而言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但我与 YK 就不是这样的关系, 我们经常互相窜门一起吃饭。像 SM 这样只是来寻求帮助的人, 我们之间不可能发展成我与 YK 那样的关系。我总是尽我所能去帮助她们, 只是帮助而已没有其他关系, 说实话并不想与她们有太多牵扯。

从 C 的话语中可以看出“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之间没有形成稳定的朋友关系只是结成了出于道德立场的“临时支援”关系。

既然“适应世代”与“经验世代”和“新手世代”都没有结成稳定的社会关系, 那么“适应世代”的“小组”关系从何而来? 上文中 C 提到“我与 YK 就不是这样的关系, 经常互相窜门一起吃饭”可以看出对 C 而言, YK 是与 SM 完全不同的存在。从表 -1 可以发现 YK 是与 C 同时期来日的“适应世代”。笔者发现与“适应世代”结成“小组”关系的成员基本是同一时期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由于同一时期到日, 不难想象在日的适应及文化的接受上她们往往处于同一水平线, 互相之间隔阂小从而易结成朋友。

“新手世代”的社会网络关系

笔者发现, “新手世代”到日后积极地向周围的中国女性靠拢, 这与前面讨论的“经验世代”和“适应世代”的态度完全不同。“新手世代”这种积极的表现源自于她们到日后生活上的实际需要。从表 -1 可以看出“经验世代”与“新手世代”的基本属性有很大差异, 例如“经验世代”是以年轻的初婚者身份嫁到日本, 而“新手世代”的大都是中年的再婚者身份且大都与中国前夫有孩子, 来日后她们面临着如何把国内的孩子带到日本或者让日本的丈夫为孩子提供抚养费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她们没有

办法找日本人商量，唯一能够求助的只有与她们有同样经历的中国女性。所以“新手世代”来日后表现出的人际交往态度与“经验世代”、“适应世代”不同，即中国妻子内部的属性差异影响着她们的社会网络建构。

此外笔者还发现，虽然当地的行政部门或者 NPO 在找工作或者租房等方面给予“新手世代”一些帮助，但这些远远无法满足她们实际生活上的需要。对“新手世代”而言，由于刚到日不久，生活中大部分问题来自于日本丈夫和婆家，在日本家庭问题属于私领域范畴不会放到公共场合进行谈论。作为支援机构的 NPO 虽然在日语学习、孩子入学、多国语言的对应等方面给予她们很大帮助，但涉及到家庭内部的事情，受日本家庭孤立性与排他性价值观的影响，工作人员没有办法插手更不用说建言献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NPO 对中国妻子的帮助是有限度的。对于以上情形 C 有以下描述。

C：她们（“新手世代”）不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跟 NPO 的人说，有些事情只能跟中国人讲。如何跟丈夫交涉把和中国前夫的孩子带到日本，如何让丈夫给孩子生活费，像这样的事就只能跟中国人商量。再如在哪儿能买到便宜的机票，如何更新签证，像这样的问题即使问日本人她们也不知道。这里（NPO）的人确实帮她们很多但不能给她们所有需要的。

在陌生的环境里对“新手世代”而言，能够快速得到需要的信息或者获取实际帮助的是与自己一样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所以她们不同于“经验世代”与“适应世代”，她们以积极的态度靠近周围的中国女性，特别是与她们有相似之处的“适应世代”。无论与她们同一时期嫁到日本的还是已经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于“新手世代”而言都可能是有用的社会资源。但是“新手世代”很多人来到日本后会马上去工作，没有时间到日语学习班学习。而日语学习班是她们扩展社会网络的重要场所，这就导致她们丧失了构筑稳定的社会关系的机会，只是在碰面时互相结识，信息共享。因此“新手世代”虽然表现出积极的结识态度但她们的社会网络成员不稳定、流动性大随机性强。

五、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总结如下。第一，嫁到日本农村的中国妻子由于①拒绝被序列化，②世代间的隔阂，③中国地区差异的再现等原因致使她们之间没有结成一定规模的互助组织。第二，不同世代的中国妻子的社会网络关系特征如表-2。

表-2 社会网络关系特征

		中国人
经验世代	早期	小组型
	现在	松散的联盟
适应世代		同世代小组
新手世代		流动性大

“经验世代”嫁到日本当初由于周围的中国人少不具备扩建社会网络的环境而建立了紧密的“小组型”社会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逐渐弱化成了“松散的联盟”。“适应世代”与“经验世代”之间由于“经验世代”的回避没有交集，与“新手世代”之间也只是形成了“临时的支援”关系，其朋友圈的成员集中于同一时期来日的人。“新手世代”由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在与中国妻子的交往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由于工作使她们丧失了构筑稳定的社会关系的机会，导致其社会网络的成员不稳定、流动性大随机性强。

本文虽只分析了中国妻子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她们与主流社会的日本人或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居民之间没有建立社会网络。由于篇幅限制关于以上议题将另文进行讨论。